



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项目资助教材

徐有富 著

治学方法与 论文写作

**A Approach to
Academic Studies
and Thesis Writing**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项目资助教材

徐有富 著

治学方法与 论文写作

A Approach to
Academic Studies
and Thesis Writing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 / 徐有富著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03. 11

ISBN 7-305-04016-9

I. 治... II. 徐... III. ①治学方法②论文-写作
IV. ①G795②H15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8329 号

书 名 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
著 者 徐有富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
电 话 025-3596923 025-3592317 传真 025-3303347
网 址 <http://press.nju.edu.cn>
电子函件 nupress1@public1.ptt.js.cn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960 1/16 印张 20.5 字数 350 千
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2000
ISBN 7-305-04016-9/G·657
定 价 38.00 元

*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在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作者简介

徐有富,1943年出生于南京,196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,1981年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,获文学硕士学位。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著有《李清照》、《校雠广义》(与程千帆合著,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,其中《版本编》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,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。四编都分别获得过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或三等奖)、《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》(主编)、《郑樵评传》、《闻一多》、《文献学研究》(与徐昕合著)等,并发表过中国古代诗学论文多篇。

目 录

开头的話	1
第一讲 怎样选题	3
一 选题的原则	3
二 选题的方法	37
第二讲 怎样查资料	49
一 查资料的意义	49
二 查资料应从目录索引入手	54
三 查资料的一般程序	62
四 查资料的其它方法	66
第三讲 怎样作社会调查	82
一 社会调查的意义	82
二 社会调查的方法	89
三 怎样搞好社会调查	95
第四讲 怎样读书	104
一 泛读	104
二 精读	116
三 读书要思考	122
四 读书要有目的	130
第五讲 怎样写读书笔记	136
一 写读书笔记的意义	136
二 写读书笔记的方法	139
三 读书笔记的载体	143
四 写读书笔记的注意事项	149
第六讲 怎样判断资料的价值	155
一 看是否原始	155
二 看是否完备	164

三	看是否可靠·····	169
四	看是否有影响·····	178
第七讲	怎样鉴别资料的真伪·····	186
一	资料真伪的含义·····	186
二	鉴别资料真伪的意义·····	188
三	辨伪的方法·····	191
第八讲	治学方法举要·····	202
一	考证·····	202
二	归纳法·····	219
三	综合研究法·····	226
四	比较研究法·····	246
第九讲	论文写作方法·····	257
一	关于标题·····	257
二	关于论点·····	257
三	关于论据·····	263
四	关于论证·····	277
五	关于引文注释·····	283
六	关于投稿·····	287
第十讲	治学态度·····	292
一	要有恒心·····	292
二	要认真·····	297
三	要有学术道德·····	301
四	要谦虚·····	306
参考书目举要	·····	317
后记	·····	320

开头的話

我們已經學習了許多課程，掌握瞭許多知識。本課程的任務是講授獲取知識的本領，告訴大家如何去讀書治學。梁啟超1923年1月13日《辭別東南大學感言》^①和程千帆1996年10月9日在南京大學中文系所做的講演，都講瞭這樣一個故事：“呂洞賓遊戲人間，在一個人傢里住了很久，臨走時，他問主人，你有什麼需要的東西我可以幫助你，那主人沒有回答他，呂洞賓就把手一指，一塊石頭變成了金子，再問要不要，他不要，呂洞賓就把一塊更大的石頭點化成金子，諸如此類，主人都說不要。呂洞賓就問他到底要什麼，那個人想了半天，說，我要你點石成金的指頭，我要瞭這塊金子就只有這塊金子，而有了這個指頭，我就什麼都可以點。……這個故事給我們的啟發就是，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個別的知识，而是要得到那個研究學問的方法，只有這樣，才能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”^②

唐代詩人高駢寫過一首題為《聞河中王鐸加都統》^③的詩：“煉汞燒鉛四十年，至今猶在藥爐前。不知子晉緣何事，只學吹簫便得仙。”詩的作者聽說別人升瞭官，很嫉妒，在發牢騷。如果我們把讀書治學比作煉丹修行，沒有掌握正確的方法，花四十年的時間也未將金丹煉出來，而掌握了正確的方法，就會事半功倍，比較容易得道成仙。

學術論文是一個人的學術水平的重要標志。王充《論衡·超奇》篇談到：“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，博覽古今者為通人，采掇傳書以上奏記者為文人，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。故儒生過俗人，通人勝儒生，文人逾通人，鴻儒超文人。故夫鴻儒，所謂超而又超者也。”因為學術論著體現瞭一個人的創造性，優秀的學術論著可以推動歷史的前進，加快人類文明的進程。在

① 《飲冰室文集》之四十，中華書局，1936年，8頁。

② 《兩點論——古代文學研究方法漫談》，《程千帆全集》第15卷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，176—177頁。

③ 《全唐詩》卷五九八，中華書局，1960年，6924頁。

五四新文化运动中,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,对中国的现代化无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。1978年5月11日,《光明日报》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的,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为主要撰稿人的论文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,对推动解放思想,深化改革的贡献也是很大的。所以,那些在著书立说方面卓有成就的人受到社会的肯定,是可以理解的。

写论文也是学习知识的好方法。胡适尝云:“发表是吸收的利器,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。”^① 因为,为了写论文而去读书,就会学得积极主动,深入细致,针对性强,而且会一边读书一边思考,同为学习而学习,为读书而读书比起来,效果当然要好得多。

读书治学也是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,是一种享受。欧阳修在《读书诗》中深有体会地说:“至哉天下乐,终日在几案。”^② 苏轼也说过:“某生平无快意事,惟作文章,意之所到,则笔力曲折,无不尽意。自谓世间乐事,无踰此者。”^③ 他们说的可能侧重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写作,学术论著的阅读与写作也一样。从事科学研究的人,特别是文科,到了年龄,也可能退休,但是他们在退休以后,仍然照样研究,照样写作,生活内容非常充实。因此,不少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很长寿。

照我们的理解,读书治学的水平主要是通过学术论著来体现的,你写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,也就说明你已经比较好的掌握了治学方法。所以本课程将重点探讨怎样写学术论文。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,科研能力并了解与掌握学术论文写作规范。

① 《读书》,《胡适文集》第4卷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8年,127页。

② 《全宋诗》卷二九〇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1—1998,3660页。

③ 《春渚纪闻》卷六《东坡事实》。

第一讲 怎样选题

经验告诉我们,治学的首要问题是选题。有一个好的选题,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就会比较顺利,容易出成果,而且很快能产生社会效益;反之则会困难重重,难以出成果,甚至会出现半途而废的现象。那么一个好的选题应当具备哪些因素呢?我们又如何确定自己的论文选题呢?

一、选题的原则

1. 选题要有用

我们写文章总希望发表,让它产生一点社会影响,或者作为一篇课程论文交给老师,希望得到好分数,那我们的论文题目就应当贯彻有用的原则,或者说我们的论文选题要有意义。林庚认为:“选题有没有意义是至关重要的。选题如果没有多大意义,即使做得很用功,做出来价值也不大。假如古诗中有那么一首作品,过去不知道作者,通过考证,知道了某一首诗的作者是谁。这种考证固然增加了知识,也可以算是学问。但如果作者既很平常,作品也很一般,本来就没有人过问,文学史也不提它。那这种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呢?任何影响也不会产生。这虽然也解决了一个问题,但这个问题是孤立的,根本不和其他问题发生任何关系,好比一潭死水,没有波澜,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。我们选择一个题目,这个问题研究出来,最好希望它富于生命。”^①

经世致用是我国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的传统观点。孔子论《诗》就特别注意发挥《诗》的社会价值,《论语·阳货》篇记载了他对学生们说的一段话就可以说明这一点:“小子何莫学乎《诗》,《诗》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;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;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后来学者们写论文也注意贯彻

^① 《发现问题和职业敏感——林庚先生访谈录》,《文史知识》1999年第4期。

有用的原则,如东汉时有人嫌王充的《论衡》的篇幅太多,王充在《论衡·自纪》篇中回答道:“为世用者,百篇无害;不为用者,一章无补。如皆为用,则多者为上,少者为下。”北宋司马光写《资治通鉴》也是为了经世致用,其《进资治通鉴表》自称:“每患迁、固以来,文字繁多,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,况于人主日有万几,何暇周览?臣常不自揆,欲删削冗长,撮举机要,专取关国家兴衰,系生民休戚,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者,为编年一书。”^① 该书的书名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。南宋的真德秀还强调了文学研究也应当经世致用,他说:“夫士之于学,所以穷理而致用也。文学之一事,要亦不外乎此。”^②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的观点尤为鲜明,指出文须“有益于天下,有益于将来,多一篇,多一篇之益矣,若夫怪力乱神之事,无稽之言,剿袭之说,谀佞之文,若此者,有损于己,无益于人,多一篇,多一篇之损矣。”^③ 他还说:“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,当世之务者,一切不为。”^④ 因此有人请他写谀墓的文章,他一概拒绝。近人黄侃认为:“人类的一切学问都应当以‘正德、利用、厚生’为目的,因此做学问是‘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后世开太平’。”他的学生殷孟伦认为:“研究学术不是为研究而研究,而是为了国计民生的利益。这正是黄先生治学的根本目的。”^⑤

当然,治学是否贯彻致用的原则,主要不是看他的宣言,而是看他的学术论著。陈寅恪虽然没有什么宣言,但是他的论著告诉我们,他也是主张做学问应当对社会的发展起一点作用。比如他在《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》中谈道:“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第一篇,其末云‘号称莲花色尼’。盖莲花色尼出家因缘也。佛教故事中关于莲花色尼颇多。此写本所述,即其一种。寅恪初取而读之,见所谓七种咒誓恶报仅载六种。”于是他查了一下巴利文有关经书,发现“所载此尼出嫁因缘,与敦煌写本大抵相同,惟其中有一事绝异而为敦煌写本所无者,即莲花色尼屡嫁。而所生之子女皆离妇,不复相识,复与其所生之女共嫁于其所生之子。迨既发觉,乃羞恶而出家焉。”这个故事内容显然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相冲突,所以被故意删掉了。^⑥ 他还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: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首。

② 《文章正宗》卷首《文章正宗纲目》。

③ 《日知录》卷十九《文须有益于天下》。

④ 《亭林文集》卷四《与人书三》。

⑤ 殷孟伦《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精神》,《量守庐学记》,三联书店,1985年,40—41页。

⑥ 《寒柳堂集》,三联书店,2001,169—175页。

释迦之教义，无父无君。与吾国传统之学术、存在之制度，无一不相冲突。输入之后，若久不变易，则决难保持。是以佛教学术，能于我国思想史上，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，皆经国人吸收改易之过程。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貌者，若玄奘唯识之学，虽震动一时之人心，而卒归于消沉歇绝。……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，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，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，在吾国思想史上，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，且亦归歇绝者。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，有所创获者，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术，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。^①

他还在《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》中，对《马氏文通》死搬硬套印欧语系语法的做法作了分析批评，指出：“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，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”，但是“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，若也同视为天经地义，金科玉律，按条逐句……施诸不同系之汉文，有不合者，即指为不通。呜呼！文通，文通，何其不通如是耶？”“由是言之，从事比较语言之学，必具一历史观念，而具有历史观念者，必不能认贼作父，自乱其宗统也。”^②

需要特别强调的是，我们不能将选题要有用的原则简单地理解为为政治服务，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套做法，恰恰是应当摒除的。也不能象汉代今文学家那样直接将古书应用于现实。梁启超指出：“两汉之间，儒者通经，皆以致世，以《禹贡》行水，以《洪范》察变，以《春秋》折狱，以《诗》三百五篇当谏书。盖六经之文，无一字不可用于用。”^③ 孙钦善进一步分析道：

今文学家标榜“经世致用”，即强调经书的直接的，简单化的实用目的。如前汉今文学家以《尚书·禹贡》治河（见《汉书·平当传》），以《尚·洪范》察变（见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），以《春秋》治狱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公羊董仲舒治狱》十六篇），以《诗经》为谏书（见《汉书·儒林传·王式传》），或当规戒（如《韩诗外传》）等；此外，今文学多言阴阳灾异，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，把儒学神化，为巩固现实统治服务。^④

① 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》，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，283—284页。

② 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，251—252页。

③ 《西学书目表后序》，《饮冰室合集》文集第1册，中华书局，1989，129页。

④ 《中国古代文献学史》，中华书局1994，63页。

在我们看来“有用”的含义是相当宽泛的,凡有益于人类进步、社会发展的选题,即使是提倡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,甚至编一部工具书,应当说都符合有用的原则。胡适曾举例道:

我为什么要考证《红楼梦》?

在消极方面,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、徐柳泉、蔡子民一般人的谬说。

在积极方面,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。我要教人疑而后信,考而后信,有充分证据而后信。^①

清人王梦阮和沈瓶庵写过一本《红楼梦索隐》,认为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,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。董鄂妃即秦淮名妓董小宛,历经波折,后为顺治皇帝纳之宫中,宠之专房,封贵妃。妃不得志,乃怏怏死。世祖痛妃切,至落发为僧,去之五台不返。诚千古未有之奇事,史不敢书。此《红楼梦》一书所由作也。鲁迅指出:“董鄂妃是满洲人,并非就是董小宛,清兵下江南的时候,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;而顺治方十四岁,决不会有把董小宛做妃的道理。”^②清人徐柳泉尝云:“小说《红楼梦》一书,即记故相明珠家事。金钗十二,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。宝钗影高澹人,妙玉影西溟先生。妙为少女,姜亦妇之美称,如玉如英,义可通假。”^③鲁迅指出:“这是因为性德是词人,是少年中举,他家后来也被查抄,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,所以猜想出来的。但是查抄一事,宝玉在生前,而性德则在死后,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,所以其实并不很相象。”^④蔡子民《石头记索引》称:“《石头记》者,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。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。书中本事,在吊明之亡,揭清之失……书中红字,多影朱字。朱者,明也,汉也。宝玉有爱红之癖,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;好吃人口上胭脂,言拾汉人唾余也。”^⑤鲁迅指出:“此说未免近于穿凿,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,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。”^⑥王梦阮、徐柳泉、蔡子民是《红楼梦》研究中索隐派的代表人物。他们都把《红楼梦》与清朝政治作简单的比附,而不要任何的证据。胡

① 《庐山游记》,《胡适文集》第4册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8,152页。

② 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8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,349—350页。

③ 陈康祺《郎潜纪闻二笔》(即《燕下乡胜录》)卷五。

④ 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8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,349页。

⑤ 岳麓书社,1999,25—26页。

⑥ 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8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,350页。

适撰《红楼梦考证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反对他们唯心的研究方法。顾颉刚曾经谈到胡适的《红楼梦考证》有两点成就：“适之先生第一个从曹家的事实上断定这书是作者的自述，使人把秘奇的观点变成了平凡；又从版本上考定这书是未完之作而经后人补缀的，使人把向来看作一贯的东西忽地打成了两橛。”^①胡适在方法论上最重要的成绩是运用了考证的方法，一切凭材料说话。胡适所倡导的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再如陈垣编纂《中西回史日历》，花了四年时间，修改了五次，他在《自序》中说：“兹事甚细，智者不为，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。余之不懈烦，亦期为考史之助云尔，岂敢言历哉！”^②应当说编纂这样的工具书，其选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

我们的选题有用，就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，产生比较大的社会影响。章太炎的学生鲁迅就说过：“清末，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，而他的声名还在孙诒让之上者，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，趋时，而且还‘造反’。”^③近现代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如梁启超、胡适、鲁迅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郭沫若等都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，他们的学术论著也是与推动中国现代文明息息相关的。当然这种参与，也不局限于政治方面，例如北方许多城市严重缺水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史念海专门研究了西安缺水问题。认为唐代长安城内可以行船，现在西安严重缺水与终南山的森林受到破坏有关。如今之计，应培育终南山的森林，增加河流流量。史念海教授谈道：

1992年，我将这个设想和建议向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，经陕西省林业厅和西安市林业局邀集西安林业专家审议，认为这是“根本解决用水困难问题的重要措施，建设这项工程意义深远”，并责成西安市林业局成立水源涵养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负责秦岭北坡，及蓝田、长安、户县和周至四县山区部分水源涵养林的建设工程。后来听说，中央林业部过问此事，并规定林业部拨款两百万元人民币作为建设经费。^④

就我个人而言，80年代初，曾有感于借书难，而南京大学图书馆的老馆长，著名图书馆学家李小缘一贯主张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，并且有许多为读者

① 《〈古史辨〉第一册自序》，《古史辨》第一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，46页。

② 《中西回史日历》卷首，中华书局，1962。

③ 《趋时和复古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五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，536页。

④ 《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》，《学林春秋》，中华书局，1998，316页。

服务的感人事迹。于是就写了篇《对读者应具摩顶放踵精神》^①的文章,很快就发表了出来。因为李小缘所提倡的这种精神,正是广大读者和图书馆工作者所迫切需要的。正如台湾学者严耕望所说,“假若你想你的工作对于别的研究者有较大用处,甚至对于一般人也有用,换言之,希望有较大影响力,那就不能不考虑实用问题。”^②

当然也有不同观点,如章太炎、梁启超、胡适、顾颉刚等著名学者,都曾反对过学以致用。但是他们的观点往往前后矛盾,难以为据。如章太炎1906年《与王鹤鸣书》云:“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,有用与否,固不暇计。……学者在辨名实,知情伪,虽致用不足尚,虽无用不足卑。”^③后来在《与钟君论学书》中又说:“学在求是,不在致用;用在亲民,不在干禄。”^④这两句话的意思都不那么周密,“不暇计”并不等于不计;“用在亲民”也还是用,而且是很重要的用。当他在谈到学以致用的时候,措词倒是非常明确的,如他对顾炎武就非常推崇,曾于1908年《答梦庵》云:“若顾宁人者,甄明音韵,纤悉寻求,而金石遗文,帝王陵寝,亦靡不殚精考索,惟惧不究,其用在兴起幽情,感怀前德,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。”^⑤20年代初,他在《说求学》的演讲中谈道:“求学之道有二:一是求是,一是应用。前者如现在西洋哲学家康德等是,后者如我国圣贤孔子、王阳明等是。顾是二者,不可得兼,以言学理,则孔子不及康德之精深;以言应用,则康德不及孔、王之切近。要之二者各有短长,是在求学者自择而已。然以中国之时势言之,则应用之学,先于求是。”^⑥这段话强调学以致用用的态度非常明确,但是认为求是与应用二者不可得兼的观点却是有点问题的,实际上两者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,求是为了更好地应用,而应用也应当求是。

胡适1919年8月16日《论国故学(答毛子水)》云:“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。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,拣选所要做的学问,拣定之后,当存一个‘为真理而求真理’的态度。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‘为真理而求真理’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。学问是平等的。发明一个字的古义,与发现一个恒星,都是一大功绩。”^⑦首先,胡适是在强调整

① 《大学图书馆通讯》1984,第1期。

② 《治史经验谈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1,72页。

③ 《章太炎全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2,151页。

④ 《文史》第2辑,中华书局,1963。

⑤ 《章太炎政论选集》,中华书局,1977,398页。

⑥ 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,中华书局,1979,620页。

⑦ 《胡适文集》第2册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8,327—328页。

理国故的重要性时说这番话的,未免过于夸张。其次,如前所说,他在从事《红楼梦》考证时,特别强调了它在治学方法方面的示范作用。后来,他在1928年9月写的《治学的方法与材料》又改口说:“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,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,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,变成妄费精力的废物。这三百年的考证学固然有一部分可算是有价值的史料整理,但其中绝大的部分却完全是枉费心思。”^①

章太炎与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也说过:“如果我们要求真知,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。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,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,不当问用不用。学问固然可以应用,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,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。从此以后,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,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。”^② 顾颉刚毕竟离开不了人生的约束,他于1936年正式成立的禹贡学会终于高举起经世致用的旗帜,该学会之《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》有云:“土居今日,欲求经世致用救亡图存之学,其道固有多端,而于吾国地理之研究,实属重要之一,盖研究吾国地理的目的,端在于明了古今疆域的演变,户口之增损,民族之融合,山川之险易,以及郡县建置、道路修筑、边城关堡之创设,运河沟洫之凌凿、土地物产之利用,其所关于民生经济及国家之大计者为至重且巨也。”^③ 我们再看看顾颉刚在古史辨、民俗学研究、历史地理、《尚书》研究等方面的成果,又有哪一项是无用的研究呢?

下面我们再讨论一下梁启超的观点,梁氏认为:“凡真学者之态度,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。夫用之云者,以所用为目的,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。为学问而治学问者,学问即目的,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。……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,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,不必问有用与无用,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,不能发达。”^④ 复称:“所谓‘学者的人格’者,为学问而学问,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。故其性耿介,其志专一,虽若不周于世用,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,必赖有此等人。”^⑤ 并强调指出:“吾前文所屡说之‘求真’两字,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‘实事求是’也。”^⑥

① 《胡适文集》第4册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8,112页。

② 《古史辨》第一册《自序》,《顾颉刚集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1,36页。

③ 史念海《顾颉刚创立禹贡学会及其以后的二三事》,《顾颉刚学记》,三联书店,2002,370页。

④ 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之十三,《饮冰室专集》之三十四,中华书局,1936,36页。

⑤ 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之三十三,《饮冰室专集》之三十四,中华书局,1936,78页。

⑥ 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《饮冰室专集》之七十三,中华书局,1936,99页。

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？我们认为纯粹的为学问而治学问的人是没的，即以梁启超用作例证的乾嘉学者而言，他们做学问同现实保持较远的距离也是迫不得已的事。正如柳诒徵所说：“前代文人受祸之烈，殆未有若清代者，故雍、乾以来，志节之士，荡然无存。有思想才力者，无所发泄，惟寄之于考古，庶不干当时之禁忌。”^①清代一些汉族官员埋头校经考史，其实也是一种姿态，表明自己对政治是漠不关心的，而这正好也表明了他们对文字狱顾虑重重。其实梁启超也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，指出：“其后文字狱频兴，学者渐惴惴不自保，凡学术之触时讳者，不敢相讲习。然英拔之士，其聪明才力，终不能无所用也。诠释故训，究索名物，真所谓‘于世无患，与人无争’，学者可以自藏焉。”^②

当时不少学者还把治学教书，修志纂谱当作终老送穷的一种手段。梁启超即指出：“其学成名著而厌仕宦者，亦到处有逢迎，或书院山长，或各省府州县修志，或大族姓修谱，或有力者刻书请鉴定，皆其职业也。”^③顾千里帮人校书，章学诚帮人修志就是典型例子。只是在这些人当中，有人厌于仕宦，有人却没有条件当官，只好替人帮忙或帮闲。

乾嘉学者校讎古籍，为后人提供了许多较为正确的文本或校勘资料，当然也是很有意义的。如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·序》云：“以予之识暗才懦，碌碌无可自见，猥以校订之役，穿役故纸堆中，实事求是，庶几启导后人，则予怀其亦可稍自慰矣夫。”^④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·序》亦称：“予弱冠时，好读乙部书，通籍以后，尤专斯业。自《史》、《汉》讫《金》、《元》，作者廿有二家，反复校勘，虽寒暑疾疢，未尝少辍，偶有所得，写于别纸。丁亥岁，乞假归里，稍编次之，岁有增益，卷帙滋多。戊戌，设教钟山，讲肄之暇，复加讨论。……廿二家之书，文字烦多，义例纷纠，輿地则今昔异名，侨置殊所；职官则沿革迭代，冗要逐时。欲其条理贯串，了如指掌，良非易事，以予儻劣，敢云有得？但涉猎既久，启悟遂多，著之铅槧，贤于博奕云尔。且夫史非一家之书，实千载之书，祛其疑，乃能坚其信；指其瑕，益以见其美。拾遗规过，非为齟齬前人，实以开导后学。”^⑤王氏欲“启导后人”，钱氏欲“开导后学”，看来他们也都不是为校史而校史。事实上，商务印书馆在出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，中华书局在出点校本《二十四史》的过程中，都把他们的著作当作重要的校勘参考

① 《《中国文化史》第三编《近代文化史》第八章《康乾诸帝之于文化》。

② 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九，《饮冰室专集》之三十四，中华书局，1936，22页。

③ 《清代学术概论》十八，《饮冰室专集》之三十四，中华书局，1936，47页。

④ 《十七史商榷》卷首。

⑤ 《廿二史考异》，《嘉定钱大昕全集》第2册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7，1页。

资料。

然而,对乾嘉学者偏重于文字校勘的考据之学的评价也不宜过高。曾国藩曾说:“嘉道之际,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,袭为一种破碎之学,辨物析名,梳文栉字,刺经典一二字,解说或至数千万言,繁称杂引,流衍而不得所归。张已伐物专诋古人之隙。”^①梁启超也指出:“国朝自顾(亭林)阎(百诗)以后,学者多务碎义,戴(东原)阮(云台)承流,益畅斯风,斤斤辨诂,愈出愈岐,置经义于不顾,而务求之于字句之间,于是《皇清经解》之书汗牛充栋,学者尽数十寒暑,疲力于此,尚无一心得,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。”^②陈寅恪批评道:

清室所最忌讳者,不过东北一隅之地,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。其他历代数千岁之史事,即有所忌讳,亦非甚违碍者,何以三百年间,史学不振如是?是必别有其故,未可以悉由当世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也。

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,俱为考据之学,故治其学者,亦并号为朴学之徒。

以谨愿之人,而治经学,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,而不能综合贯通,成一有系统之论述。以夸诞之人,而治经学,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。因其材料残缺而又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,故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,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。

于是一世才智之士,能为考据之学者,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。其谨愿者,既止于解释文句,而不能讨论问题。其夸诞者,又流于奇诡悠谬,而不可究诘。虽有研究史学之人,大抵于宦成以后,休退之时,始以余力肆及,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。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,由今思之,诚可哀矣。^③

胡适也批评道:“那班崇拜两汉陋儒方士的汉学家固不足道。那班最有科学精神的大师——顾炎武、戴震、钱大昕、孔广森、王念孙、王引之等——他们的科学成绩也就有限的很。他们最精的是校勘训诂两种学问,至于他

① 《曾文正公集》卷一《朱慎甫遗书序》。

② 《读书分月课程》,《饮冰室专集》之六十九,中华书局,1936,2页。

③ 《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》,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,三联书店,2001,269—270页。